

主持人语：

“孝亲尊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系。《淮南子》就曾描述：“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本期刊载的四篇文章，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的传统孝文化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刘亚东文章《论〈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的是雍正时期编纂的康熙晚年训诫皇子皇孙的一部语录体家训，由此可看出雍乾二帝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康熙的宽仁治国理念，文章进而梳理了封建帝王如何由家教上升到社会教化，统治者的身体力行如何推动了清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陈保同、尤吾兵文章《论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活化”》，指出所谓“活化”，即对传统孝文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内涵与形式上汲取精华，去其糟粕，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丁亚鹏、韩晓阳文章《传统“孝道”的合法性来源及其现代启示》，从学理层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孝道”的三种合法性：一是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二是世俗化的“情”的推动，三是与“天”、“理”、“良知”等形而上的概念相通。杨孝青的文章《论孔孟孝道思想的基本特质与现代传承》，一分为二分析了“父权至上”、“君权至上”的孝道理论如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枷锁，而“在家尽孝”向外延伸就是“为国尽忠”，成国中国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渊源，所以要弄清楚“父慈子孝”的本来面目，在全社会营造孝老爱亲、热爱祖国的良好氛围。

（主持人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会长）

论《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刘亚东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庭训格言》是一部记载康熙帝教子训词的家训，共计二百四十六则，体现了康熙帝对皇子的舐犊情深和谆谆教诲，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皇族内部而言，雍乾二帝继承和发展了《庭训格言》中的宽仁治国理念；从社会层面上看，《庭训格言》成为清代帝王进行社会教化的中间桥梁，实现了从“圣谕十六条”到《圣谕广训》的过渡，由帝王家教升华至社会教化；从家训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清代帝王重视家教和士大夫家风训导，且追述编纂家训著述，其身体力行的举措推动了仕宦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庭训格言》；清代；皇族；社会教化；家训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21)02-0005-10

《庭训格言》一书编纂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为雍正帝授意，与其诸兄弟一起追述其父康熙帝晚年训词而成的，凝聚着康熙帝的家教智慧，其思想主要包括了治学、处世、为政和养生四个方面。治学方面，康熙帝既重视传统的读书明理，又强调技艺学习和生活常识的掌握；处世方面，康熙帝要求子孙积善修德，做到心存善念、践行孝道、

诚信主敬、慎独节制、以义为利、崇俭勤劳，循序渐进地由人至圣；为政方面，康熙帝强调要施以仁政、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同时从自身做起严于律己、善察自省、严管下人；养生方面，康熙帝重视内外兼修，保持好的心态，顺其自然且谨慎对待饮食、医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康熙帝的家教思想以儒家礼教为本，并融合了佛道思想和满族传统

收稿日期：2021-01-15

作者简介：刘亚东（1994—），男，回族，陕西西安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礼俗,同时重视实用性和科学性,整体上呈现出综合全面、兼容并蓄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在教化方式上《庭训格言》也区别于历代帝王家训,强调早教严教,并以自身经历来教育皇子,语言通俗易懂,更方便了帝王家教向皇子,甚至于仕宦和民众的渗透。《庭训格言》对清中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出帝王家教对仕宦家教、社会教化,由上至下地渗透与互动,在家训文化史、清代社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奠定了雍乾二帝治国理念的基础

康熙帝晚年留下训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皇子,于修身、治国、治学、养生等各个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康熙帝晚年曾言:“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之凉薄,性之不敏,而此心此念,竟守五十年夙夜无间,即纤悉细务,不敢稍有怠忽。”^[1]修身以诚敬,治国以宽仁,这是康熙帝处世为君六十年的总结。“诚敬”者,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且表里如一;“宽仁”者,待人宽厚,以德服人且民生务本,这种诚敬宽仁的理念在《庭训格言》中也颇有体现,且直接影响了雍正和乾隆二帝。

雍正帝最直接受到康熙帝影响,尤为重视践行康熙帝的训诫,在修身为政各方面都秉持着诚敬、宽仁和务实的理念。一方面,在处理康熙帝身后事和落实孝道方面,雍正帝表现得极为诚敬,特别是在礼制方面做了很多改革,例如陵寝制度、祭祀丧葬制度、帝后加谥制度等等^[2],因而雍正帝讲到:“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祇此一念可以自信。”^[3]可见诚敬是雍正帝一直秉持的处世之道。另一方面,务实和宽仁也是雍正帝所秉持的为政之道。“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朕继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以有济天下者。”^[3]²³⁸雍正帝在位期间改革了满洲弊政,特别是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等财政方面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做到了务实而重视民生。

雍正帝即位后对康熙帝的宽仁理念予以继承和改进。经历了康熙帝晚年吏治腐败和诸子夺嫡的情形,雍正帝意识到,对于不敬愚昧之徒“非可

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4]²¹³。再加之雍正帝的帝位合法性危机这一特殊因素的存在^①,雍正一朝整体上实行的是比较严苛的政风,这在雍正帝处置八爷党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案中均有体现,而雍正帝对这种严苛政风作了解释:

帝王为治之道,有应宽者,则用宽而非废法;应严者,则用严而非滥刑。古人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惟宽严得当,乃为相济。朕经理万几,用宽用严,皆因其人之自取,物来顺应,初无成见,惟斟酌情理之至当而行之。天下惟有一理,诸臣须知朕今日之义,即皇考当日之仁,朕今日之仁;即皇考当日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使得其平,此圣人所以言平天下也。^[3]⁴⁷⁸

在雍正帝看来,他与康熙帝所谓的“宽仁”治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因时因事,加以改变。宽仁与严苛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愚昧不法之徒自然要严刑峻法。但是终雍正一朝,似乎严苛仍为主流,雍正帝整顿吏治,树立皇帝权威,从而加强君主专制以维护统治,成为其治国之要领。这也为乾隆朝达到鼎盛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少年时就受到了祖父康熙帝的宠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秋便被带到了避暑山庄读书学习,深受康熙帝宽仁理念的影响。在乾隆帝还是皇子时所编纂的《乐善堂文集》中,他便提到了“宽则得众”的观念:

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已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治,亦何益哉?孔子举宽信敏公,以明历圣之道,而以宽为首,圣人教人之意,其深切而着明矣乎?^[5]

即位之前的乾隆帝意识到了宽仁得众的重要性,太过偏急而刻薄严苛,即使勤于政事也不得益处,因而和雍正帝则是完全相反的执政思想。乾隆帝即位之初对祖父和父亲两代治国方针作了充分总结: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

① 参见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卷二“帝位合法性危机与雍正治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出版。

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絀,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6]216}

乾隆帝即位之初对康熙二帝的宽仁理念作了再次改进,得出了“贵乎得中”的结论,延续了在皇子时期“宽则得众”的理念,逐渐发展为“宽而有制”,他告诫臣子们:

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和事理,俾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倘不能如是,恐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此不惟臣工之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更即朕之不幸矣。^{[6]216-217}

由上可见,乾隆帝即位初期,主要还是以康熙帝宽仁理念为本,对雍正帝严苛理念作以调整。宽与严,因时因事、具体操作,对雍正朝留下的允禩集团案和曾静反清案,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允禩集团纠之以宽,曾静反清案纠之以猛^[7],但对允禄和弘皙^①等结党营私案则采取严苛的态度。这种“宽而有制”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缓解雍正朝较为紧张的政治局面,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中年之后的乾隆帝,逐渐意识到了“宽而有制”理念所存在的弊端,刑法条文趋于废弛,违法乱纪、结党营私频频出现,所以他及时调整,全面整顿吏治,在宽仁政策中注入严猛成分,有针对性地强化严的色彩。^[8]

《庭训格言》中强调:“盖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时有推迁,世有变易,随时斟酌、权衡轻重而不失其经,此即所谓权也。”^[9]无论是雍正帝在位期间实行严苛理念,加强君主专制,还是乾隆帝由“宽而有制”逐渐到趋于严猛,全面整顿吏治,都是因时因势对康熙帝宽仁理念的继承与改进,一定

程度上也践行了康熙帝经权变通的训诫理念,是对康熙帝训诫的遵循与落实。

二、促进了清初帝王教化思想的完善

古代家训家谱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家教家风,清代文学家魏象枢在《寒松堂集》中讲到:“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教化即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10]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也曾说过“家庭之教,又必源于朝廷之教”^[11]。可见家庭教育与社会教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帝王之家可谓全社会之大家,帝王家训也就成为帝王家教上升至社会教化的桥梁。《庭训格言》较之《帝范》《皇明祖训》和《圣学心法序》更具通俗性和普及性,更具有帝王家训谆谆教诲的良苦用心,所以对后代帝王治家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有利于后世之君将生活中的琐碎教导上升至对全社会的教化,对清初帝王教化思想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初帝王教化思想直接受影响于明太祖《圣谕六言》,顺治九年(1652年)更名为《六谕卧碑文》而颁行全国,二者仅一字之差,精神实质完全吻合。^②后至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颁布《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等一系列谕令,这种明伦教化的理念方逐渐成熟。顺治帝亲自御制圣谕以教化百姓,彰显了其殷切推行教化之意,实质则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来教化臣民,是对儒家教化之道的落实和践行,明伦教化以化民成俗,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

康熙帝即位后,明确了“尚德缓刑,化民成俗”^[12]的教化理念,在《六谕卧碑文》的基础上再加阐释,于康熙九年(1670年)九月下谕:

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13]461}

康熙帝在谕令中强调了社会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认为教化和刑罚是本与末的关系,如果过度追求刑罚而忽视社会教化,便是舍本逐末。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际,应效仿古之圣贤君主

① 允禄,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乾隆朝受爵和硕庄亲王;弘皙,康熙帝嫡孙,废太子允礽第二子,雍正、乾隆朝受爵和硕理亲王。二人于乾隆四年(1739年)因结党营私罪免职去爵,弘皙因罪重被圈禁。

② “圣谕六言”颁布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其内容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顺治帝在此基础上改“毋”为“无”,重新命名为《六谕卧碑文》,二者虽一字之差但精神实质相同。

化民成俗,加强向导,具体要求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讐忿以重身命。^{[13]461}

十一月,礼部将此题名为“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13]466}即位之初的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实为少年天子继承其父遗志,对《六谕卧碑文》的进一步扩充。随着康熙帝学识的增长和治国理念的形成,加之诸皇子的成长和夺储风波,帝王家教和社会教化已经不可分割,因此《庭训格言》中康熙帝对皇子们的教导也就成为未来后继之君教化臣民理念的重要来源。

《庭训格言》中的训词主要选自康熙帝晚年,特别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后,太子允礽失宠直到两次被废,这期间诸皇子夺储愈演愈烈,且朝中吏治腐败。雍正帝登基,秉持较为严苛的为政理念,整顿吏治且加强社会教化。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以康熙帝“圣谕十六条”为基础,“推衍其文,共得万言”^{[3]266},颁布《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开篇即以“孝悌人伦”为基,“圣人之德,本于人伦;尧舜之道,不外孝弟”。治家以孝悌为本,作为子女要意识到:“父母之德实同昊天罔极,人子欲报亲恩于万一,自当内尽其心,外竭其力,谨身节用,以勤服劳,以隆孝养。毋博弈饮酒,毋好勇斗狠,毋好货财、私妻子。”同时,“推而广之,如曾子所谓: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阵无勇非孝,皆孝子分内之事也”。移孝作忠,是孝子奉孝之最终目标,具体之事包括了居处庄、为官敬、交友信、征战勇等各方面。另外雍正帝还提到了“夫不孝不弟,国有常刑。然显然之迹,刑所能防;隐然之地,法所难及”^{[14]592-593}。不孝不弟固然有律法来防控,但是法也有遗漏之处,必将以教化谕令来补充。《圣谕广训》中所提倡的孝悌理念,已从《庭训格言》中单纯地要求至诚至敬,衍生至移孝作忠、为法教化的高度,这也是帝王家教向社会教化的升华。

诸如此类,在《圣谕广训》中还有很多对《庭训

格言》思想的继承与升华。

在“重农桑以足衣食”一节中,雍正帝首先强调:“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者天子亲耕,后亲桑,躬为至尊,不憚勤劳,为天下倡。”^{[14]595}养民在于农桑,为君者要不辞辛劳,劝课农桑。另外雍正帝讲到:

愿吾民尽力农桑,勿好逸恶劳,勿始勤终惰,勿因天时偶歉而轻弃田园,勿慕奇赢倍利而辄改故业。苟能重本务,虽一岁所入公私输用而外,羨余无几,而日积月累,以至身家饶裕,子孙世守,则利赖无穷。不然而舍本逐末,岂能若是之绵远乎。^{[14]595-596}

且“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勿夺民时,勿妨民事。浮惰者惩之,勤苦者劳之,务使野无旷土,邑无游民,农无舍其耒耜,妇无休其蚕织”。为民者要尽力农桑,切忌舍本逐末,方可保证世家富饶;而为官者也应及时教化民众,劝课农桑,惩戒与奖赏并行。“自古盛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兴,其道胥由乎此。”^{[14]596}《庭训格言》中民生务本、劝课农桑的治国理念,在《圣谕广训》中延伸至对民、对臣之教化,统治者行民生教化的目的,就是要让臣民归顺。

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两节中,雍正帝强调:“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圣功王道悉本正学。至于非圣之书,不经之典,惊世骇俗,纷纷藉藉,起而为民物之蠹者,皆为异端,所宜屏绝。”^{[14]599}这里的“正学”,自当是儒学;而圣贤之书,亦当是儒家经典。除此之外的异端学说,宜当摒弃。另外,要重视学校教育,“务令以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所读者皆正书,所交者皆正士。确然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14]598}。学习自当以读书明理为主,技艺为后,礼义廉耻可守可存。

另外,雍正帝在“务本业以定民志”一节中对士农工商兵五业本务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行各业能够:

凡为士农,为工商以及军伍业虽不同,而务所当务则同也,夫身之所习,为业心之所向,为志所习。既专则所向自定。……夫天下无易成之业,而亦无不可成之业。各守乃业,则业无不成。各安其志,则志无旁鹜。毋

相侵扰,毋敢怠荒。^{[14]603}

《庭训格言》强调,为学重在读书明理,心有所专;且体认事务,学以致用。《圣谕广训》不仅强调以儒学为正学,以儒家经典为读书要旨;而且教化各行各业,应尽其力、应务其本,可谓是对《庭训格言》家教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

综上所述,从《六谕卧碑文》到“圣谕十六条”,再到《圣谕广训》,清前期帝王教化思想得以完善,期间《庭训格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庭训格言》一书迟于《圣谕广训》纂修成书,但其包含的帝王训诫则是康熙帝晚年所留,是康熙帝近七十载修身治家治国的总结,主要训诫对象是以雍正帝为主的诸皇子。雍正帝即位后所颁《圣谕广训》,将《庭训格言》中的帝王家教思想,进一步延伸和升华,从而上升至社会教化思想。

三、推动了清代仕宦家训文化的发展

古代帝王家训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家训文化的

繁荣发展,正如程时用先生所言:“帝王重视对皇族子孙的训诫,身体力行地参与家训文化的建设,通过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宣传,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效仿。”^[15]帝王家教与帝王教化相辅相成。清朝自顺治帝起便十分重视教化万民,康熙帝教子与教民并驾齐驱,其教子思想为继任者雍正帝追述汇编成《庭训格言》,其教民理念为雍正帝延伸衍义为《圣谕广训》。雍正之后乾隆、嘉庆二帝也深受父祖影响,参与至家家训文化的建设中。清初至中期这种重视家家训的理念和示范性举措,深刻影响到了仕宦家训文化。

为了便于管窥清前期家训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笔者依据《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和《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所收录清代家训文献目录,并搜集《四库全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续编、新编)等文献,对顺康雍乾四朝所著仕宦家训文献进行梳理,并列

表1 清初至中期仕宦家训文献基本概况表^①

作者	著作	成书/初刻大致时间	备注
孙奇逢 (1584-1675)	《孝友堂家规》 《孝友堂家训》	顺治十七年(1660年) 康熙中叶《孙夏峰文集》刻本	子孙追录编纂
王时敏 (1592-1680)	《家礼酌》 《奉常家训》 ^② 《西庐家书》 ^③	康熙七年(1668年) 康熙九年(1670年) 康熙五年(1666年)	
丁耀亢 (1599-1669)	《家政须知》	康熙八年(1669年)	
刘德新 生卒年不详	《余庆堂十二戒》	康熙九年(1670年)	
冯班 ^④ (1602-1671)	《家戒》 《训子贴》 《遗言》 《将死之鸣》	约康熙十年(1671年)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编订 约康熙十年(1671年)	其侄冯武搜辑编订
陈确 ^⑤ (1604-1677)	《丛桂堂家约》 《补新妇谱》	不详	
张习孔 (1606-?)	《张黄岳家训》 ^⑥	康熙九年(1670年)	
秦云爽 生卒年不详	《秦氏闺训新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傅山 (1607-1684)	《霜红龕家训》	约康熙二十年(1681年)	

① 列表内仅包括传世家训文献,未包括亡佚文献。

② 收录于1916年的《王烟客先生集》。

③ 收录于《丙子丛编》。

④ 四篇家训均收录于《常熟二冯先生集·钝吟杂录》。

⑤ 两篇家训均收录于《陈确集》,1979年中华书局整理本。

⑥ 收录于《檀几丛书》。

表1 清初至中期仕宦家训文献基本概况表续

作者	著作	成书/初刻大致时间	备注
张文嘉 (1611-1678)	《重定齐家宝要》	约康熙三年(1664年)以前	
张履祥 ^① (1611-1674)	《训子贴》 《近古录》	康熙四年(1665年) 康熙六年(1667年)	
陆圻 (1614-?)	《新妇谱》	顺治十三年(1656年)	
柴绍炳 (1616-1670)	《训女篇》 ^②	不详	
于成龙 (1617-1684)	《于清端公治家规范》 ^③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本	
金敞 (1618-1693)	《家训纪要》 《宗约》 《宗范》	康熙六年(1667年)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刻本	摘录其父恬斋先生训子札记 辑录前人嘉言懿行 (三篇家训收录于康熙间刻本 《金暗斋先生全集》)
毛先舒 (1620-1688)	《家人子语》	不详	
梁熙 (1622-1692)	《哲次斋家训》 ^④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刊本	
徐枋 (1622-1694)	《诫子书》 ^⑤	清康熙刻本	
蓝润 (?-1665)	《家言》 ^⑥	顺治十四年(1657年) 至康熙四年(1665年)	
李淦 生卒年不详	《燕翼篇》	不详	
朱用纯 (1627-1698)	《治家格言》 《朱柏庐先生劝言》	不详	
汤斌 (1627-1687)	《常语币存》 《汤文正公家书》 ^⑦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 乾隆十七年(1742年)刻本	其长子杨溥与众门人整理而成 其孙汤之璫于乾隆初年编辑而成
吕留良 (1629-1683)	《吕晚村先生家训》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后	其长子吕忠及弟子员麇于 康熙中叶编辑而成
蒋伊 (1631-1687)	《蒋氏家训》	不详	于先人家训所补充与修订
石成金 (1660-?)	《天基遗言》 ^⑧	不详	
靳辅 (1633-1692)	《庭训》	不详	收录于《传家宝全集》,2000年 中州古籍出版社整理本
许汝霖 (?-1720)	《德星堂家订》	康熙五十年(1711年)	

① 两篇家训均收录于《杨园先生全集》,2002年中华书局整理本。

② 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柴省轩先生文钞》。

③ 收录于康熙刻本《于清端公外集》。

④ 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哲次斋集》。

⑤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居易堂集》。

⑥ 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聿修堂集》。

⑦ 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汤子遗书》。

⑧ 收录于《传家宝全集》,200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整理本。

表 1 清初至中期仕宦家训文献基本概况表续

作者	著作	成书/初刻大致时间	备注
高拱京 (生卒年不详)	《高氏塾铎》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本	
张英 (1637-1708)	《聪训斋语》	上卷: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	
	《恒产琐言》	下卷:康熙四十年(1701年)	
傅超 (1639-1702)	《傅氏家训》	不详	
		康熙四十年(1701年)刊本	
李锐 (1638-1707)	《李惺庵家训》 ^①	康熙四十年(1701年)刊本	
胡翔瀛 (1639-1718)	《竹庐家牒》 ^②	民国五年(1916年)印本	
颜光敏 (1640-1689)	《颜氏家诫》 ^③	嘉庆三年(1798年)刊本	
崔学古 (生卒年不详)	《幼训》 ^④	不详	
查祺 (生卒年不详)	《新妇谱补》 ^⑤	不详	
钟于序 (生卒年不详)	《宗规》	不详	
窦克勤 (1653-1708)	《寻乐堂家规》 ^⑥	康熙十六年(1677年)	秉承其父遗志编纂
胡方 (1654-1727)	《信天翁家训》 ^⑦	不详	
王心敬 ^⑧ (1656-1738)	《丰川家训》 《四礼宁俭编》 《训子贴》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不详 不详	
潘宗洛 (1657-1717)	《诚一堂家训》 ^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刻本	
蓝鼎元 (1680-1733)	《女学》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吴瞿 (?-1736)	《茗州吴氏家典》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对本宗族家规家礼总结修订
陈梦雷 (1650-1741)	《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汇辑先秦至清初家范主要资料
聂继模 (1671-?)	《诫子书》	乾隆十四年(1749年)	收录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牧令书辑要》
张廷玉 (1672-1755)	《澄怀园语》	乾隆十一年(1746年)	
周召 (生卒年不详)	《双桥随笔》	康熙十五年(1676年)	

①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读书杂述》。

② 收录于《胡绎阳文集》，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③ 收录于《孔子文化大全》，1989年山东友谊书社影印本。

④ 收录于《檀几丛书》。

⑤ 收录于《檀几丛书》。

⑥ 收录于《婁静庵先生遗书》。

⑦ 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

⑧ 前两篇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丰川全集》，后一篇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丰川续集》。

⑨ 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潘中丞文集》。

表 1 清初至中期仕宦家训文献基本概况表续

作者	著作	成书/初刻大致时间	备注
涂天相 ^① (1668-1740)	《静用堂家训》 《幼仪杂箴》 《杂箴》	清康熙间影印	
王云廷 ^② (生卒年不详)	《宝盐堂家戒》	雍正十三年(1735年)	
汪惟宪 (1682-1742)	《寒灯絮语》	雍正八年(1730年)	
尹会一 (1691-1748)	《四箴录》 《健余堂宗法记》 ^③	乾隆十三年(1748年)	
郑燮 (1693-1765)	《郑板桥家书》 ^④	乾隆十四年(1749年)	
张师载 (1696-1761)	《课子随笔钞》 《养正遗规》	乾隆八年(1743年) 乾隆四年(1739年)	辑录前人治家教子文献
陈宏谋 (1696-1771)	《教女遗规》 《训俗遗规》 《陈宏谋家书》 ^⑤	乾隆七年(1742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 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其六世孙陈庆鸿搜集编纂
王士俊 (1683-1750)	《闲家编》	雍正十二年(1734年)	辑录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言论
黄涛 (生卒年不详)	《家规省括》	乾隆二年(1737年)	辑录前贤言论
金牲 (1702-1782)	《家诫诗》 ^⑥	不详	
林良铨 (1700-?)	《麟山林氏家训》	乾隆三十年(1765年)	
李海观 (1707-1790)	《家训諄言》 ^⑦	乾隆三十四年(1778年)	
纪昭 (1717-1770)	《养知录》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姚澍 (生卒年不详)	《姚氏家训》	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陆一亭 (?-1794)	《家庭讲话》	嘉庆十年(1805年)刻本	子陆韜身后辑录
郝培元 (1730-1800)	《梅叟评议》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孟超然 (1731-1797)	《家诫录》 ^⑧	嘉庆二十年(1815年)刻本	辑录古人家训及经史子集中告诫子弟诗文
汪辉祖 (1731-1807)	《双节堂庸训》 ^⑨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鲁九皋 (1732-1794)	《广仁庄条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刻本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山木居士外集》

① 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静用堂偶编》。

② 收录于黄涛《家规省括》。

③ 收录于《丛书集成新编·健余先生文集》。

④ 收录于《郑板桥集》，1962年中华书局。

⑤ 据《陈宏谋家书》整理，199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印本。

⑥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静廉斋诗集》。

⑦ 收录于《歧路灯·附录》。

⑧ 收录于清嘉庆《亦园亭全集》刻本。

⑨ 收录于清光绪《龙庄遗书》刻本。

就目前所见到的家训著述统计而言,清初至中期著录家训文献的官僚士大夫有65位,家训著作86部;另尚有未列入表中的乾隆朝以后著录家训文献的官僚士大夫52位,家训著作56部;再加之《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中所列佚失的家训著作46部。清代著录家训文献的官僚士大夫粗略统计为163位,家训著作188部,其中传世可见的是117位、142部。据陆睿博士论文统计,《中国古籍总目》中子部儒家类著录有唐人家训2种,宋人家训20种,元人家训2种,明人家训33种,清人家训138种。^[16]《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和《中国历代家训集成》两部书更为详尽地对清代家训文献作以统计收录。再加之明清时期谱牒撰修的繁盛,未传世之家训家规更是汗牛充栋。可见,清代是家训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且从表1中分析可见,清初至中期官僚士大夫家训主要集中在康熙朝中叶至雍正朝晚期,主要有51位、75部,而乾隆朝仅有14位、21部。^①前文中提到,康熙帝于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年)衍义为《圣谕广训》;另外,康熙帝齿序内长子胤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经筵日讲转为太子会讲、日讲,晚年康熙又留下训词而被雍正帝于雍正八年(1730年)追述编纂为《庭训格言》。康熙朝中叶至雍正朝晚期的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其传世家训远远超过乾隆朝六十余年所著录的数量。相较之下,康雍二帝对清前期官僚士大夫家训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这其中《庭训格言》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康熙中叶以后,仕宦家训文化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与康熙帝及后代几任帝王重视家教家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从表中可见,清前期家训文献中不乏有对先贤家训辑录而成之作,为历代家训文献所不及。这与康熙帝授命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有密切关系。《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编撰,历时四年完成,雍正四年(1726年)重新编订成书。其《家范典》共31部,汇集了先秦至清初家范方面论说、诗文、史事等主要资料。^[17]正如雍正帝评价此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洵为典籍之大观。……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

意。”^{[2]55}康熙帝钦命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有怀古博览之意。其中包括了《家范典》,辑录历代家范家训资料,也带有康熙帝自身重视家训文化建设的意图。张廷玉评价《古今图书集成》“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象,未有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诚策府之矩观,为群书之渊海”^[18]。而后张师载《课子随笔》、王士俊《闲家编》、陈宏谋《五种遗规》、黄涛《家规省括》、孟超然《家诫录》等家训著录都辑录了先贤教子治家之训诫,保留了很多未传世的家训篇章。

与此同时,清中期帝王也极为重视对仕宦家族的教化和惩治。一方面,对孔氏后裔进行训导。雍正帝在召见衍圣公孔传铎次子孔继溥等人时曾下谕:“尔等是圣贤后裔,与众不同。必心为圣贤后裔之心,恪守先圣先贤之训,方为不愧……慎修厥德、以继家声。”^{[3]287}乾隆帝也曾下谕训示衍圣公孔广燾等人:“尔等既为圣贤之后,即当心圣贤之心,凡学圣贤者,非徒读其书而已,必当躬行实践,事事求其无愧,方为不负所学。况身为圣贤子孙。尤与凡人不同,若不能实加体验,徒务读书之名,实于祖德家风,不能无忝,尔等务须勤思勉励,克绍先传。”^{[19]39}孔氏后裔实为天下士人官宦之楷模,更应重视家教,保持良好家风,以附君主之托,示范天下。

另一方面,对仕宦子弟进行嘉奖或惩治。“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宣力……张若霭禀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20]“大学士之子鄂容安、张若霭、朱必阶,皆能遵守家声,祇受国恩。”^{[19]736}大学士张英一门忠烈,其后代张若霭受到了良好的家教,秉持家风矢志不移,因而能够受到国家器重。同为深受国恩的大学士高斌之孙高朴治家不严,纵容下人李福借办贡品之名私卖玉石,其叔高晋身为两江总督却心存袒护,乾隆帝将高朴明正典刑。类似例子非常多,体现出清中期帝王对仕宦家族的教化和惩治。

综上所述,清初至清中期统治者身体力行参与家训文化建设,对仕宦家族进行教化和惩治,其示范举措深刻影响到了官僚士大夫,家训著述层出不穷,推动了清代仕宦家训文化,特别是康熙朝中叶以后仕宦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

清代晚期,曾国藩所留训诫汇编为《曾国藩家书》,官僚士大夫家训发展达到顶峰。在《曾国藩

① 主要以著录家训文献的官僚士大夫生活年代和家训文献成书、初刊年份综合分析而定。

家书》中,曾国藩曾告诫其子曾纪泽:“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21]可见曾国藩非常推崇康熙帝《庭训格言》和张英《聪训斋语》二书,康熙帝《庭训格言》对清代家训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四、结 语

总的来说,《庭训格言》作为康熙帝对后世之君训诫教导之家训,对清中前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庭训格言》家教思想直接影响到雍正帝和乾隆帝,对二位帝王治国理念的选择和实践产生极大作用。其次,《庭训格言》中帝王家教思想也成为雍正朝《圣谕广训》教化思想的基本源泉,雍正帝在对康熙帝“圣谕十六条”衍义过程中,将康熙帝所留训诫由家教理念上升至治国教化理念,凸显出帝王家教到帝王教化,这种家国同构、由上至下的跨越。最后,康熙帝和雍正帝积极参与到家训文化的建设中,其教子治家的理念深刻影响到了官僚士大夫,促进了清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康熙帝钦命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家范典》收集了历代先贤治家之训诫,雍正帝又对父亲的训诫进行追述汇编,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清代官僚士大夫辑录先贤先祖家训教育子孙,保留了很多未传世的家训著述,且清中期帝王加强对孔氏后裔和仕宦家族的教化和惩治,都对清代家训文化发展和仕宦家族家风保持具有重要意义。《庭训格言》作为古代帝王家训的顶峰,蕴含着康熙帝以儒家礼教教子治家的家训思想,同时以帝王家教带动帝王对臣民之教化,侧面反映了古代帝王以儒家教化之道治理国家,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统治,展现了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朝廷与家族联手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参 考 文 献〕

- [1] 康熙撰.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四库全书本:第一二九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2.
- [2] 刘亚东.论雍正帝的孝治理念与实践[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5).
- [3] 鄂尔泰,张廷玉.清世宗实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 中国第一档案历史馆编.雍正朝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213.
- [5] 乾隆.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M]//四库全书本:第一三〇〇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90.
- [6] 庆桂,董诰.清高宗实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 唐文集,罗庆泗.乾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
- [8] 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289.
- [9] 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23.
- [10] 魏象枢.寒松堂集[M]//丛书集成新编本:第七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286.
- [11] 张伯行.养正类编[M]//丛书集成初编:第三十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3.
- [12] 昆岗.清会典事例: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422.
- [13] 马齐,朱轼.清圣祖实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雍正.圣谕广训[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 程时用.历代帝王与我国传统家训的发展[J].河南社会科学,2010(2):186.
- [16] 陆睿.明清家训文献考论[D].浙江大学,2016:29.
- [17] 赵振.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M].济南:齐鲁书社,2014:366.
- [18] 张廷玉.澄怀园语[M]//丛书集成续编本:第七十八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558.
- [19] 庆桂,董诰.清高宗实录: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0] 鄂尔泰,张廷玉.清世宗实录: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686.
- [21] 曾国藩家书[M].钟叔河,整理校点.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593.

(责任编辑:祝春娥)